

回忆阿合买提江

(下)

玛依努尔·哈斯木 著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回忆阿合买提江

(下)

玛依努尔·哈斯木 著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37. 二月惨案

1947年2月22日，阿合买提江中断视察，匆匆由鄯善县赶回迪化，没有顾得上回家看我一眼，带着赖希姆江急急忙忙赶到省联合政府大楼，参加大楼内等待他到来的紧急会议。包尔汉、阿巴索夫、赛福鼎等我方委员均已提前到会。此时张治中主席不在迪化，他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全会。省联合政府其他委员均已到会。

阿合买提江的到来给我方人员以极大的鼓舞，而对对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些好心人也曾担心阿合买提江这时候来了，怕会不会遇到麻烦，还是不来为好。而顽固分子则断言阿合买提江在吐鲁番躲起来了，根本不敢回来。他们带着嘲笑的目光朝我方人员溜眼。就在这时候阿合买提江健步走进会议室。当他突然出现在国民党高官面前时，这些顽固分子大吃一惊，一个个目瞪口呆。

的确，新疆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在盘算着制造事端，企图寻找机会消灭联合政府的三区代表。这时候蒋介石已公开其反共面目，拒不执行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为了表示抗议，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2月将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办事处相继撤回延安。新疆的国民党当局配合蒋介石的战略，认为时机已到，暗中磨刀霍霍，企图彻底破坏联合政府。为了找借口，国民党顽固分子四处散布谣言，硬说于昨日发生的“2·21”群众游行事件是“阿合买提江煽动引起的”。

阿合买提江对此早有耳闻。今天的会议上他镇定自若，一如既往主持召开省政府紧急会议。面对发生的问题，阿合买提江要求各方保持克制，严格执行《和平条款》。他严正警告有人在蓄意制造矛盾，企图酿成流血事件，这将会受到严厉制裁。会议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就撤销莎车专员周方刚与和田专员郝登榜（即努尔别克）的职务进行了争论。会议上，联合政

府派往莎车负责监选工作的省政府副主席包尔汉先生报告了莎车的选举工作，并用大量事实指出专员周方刚勾结国民党军警、破坏民主选举的严重行为。接着，阿巴索夫向会议递交了游行群众提出撤销周方刚和郝登榜专员职务等八条内容的书面报告。包尔汉、阿巴索夫、赖希姆江、赛福鼎等表示坚决支持这一意见。但是，刘孟纯、王曾善、贾尼木汗等坚决反对。由于双方争论不休，很难形成统一意见，阿合买提江最后提出让群众派代表直接与与会者转达他们的意见，建议等大家听完后再作最后决定。大家同意这个意见，争论暂时得到了缓解。

不久，阿不来提·买合苏木等群众代表进入会场，陈述游行群众所提出的要求，揭露在南疆军警武装镇压人民群众的暴行，列举大量事实指出这是顽固势力所为。在铁的事实面前，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哑口无言。最后，阿合买提江作出了撤销莎车专员周方刚、和田专员郝登榜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国民党顽固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

2月22日当晚，宋希濂、刘孟纯、党必刚、谢永存、梁可浔等在新楼开会，制订了坚决反击三区领导人的计划，密谋组织“以游行反游行，以请愿反请愿”的群众游行活动，以此来打击三区代表。

2月23日，所谓群众“以游行反游行，以请愿反请愿”的阴谋粉墨登场。然而只有几百人上街走了几圈，空喊几句口号就散了。显然这次的群众游行没有达到制造事端的真正目的。这结果实在是让顽固派很是不过瘾。不过他们仍不罢休，还要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

2月24日早晨，国民党顽固分子再次组织不明真相的回族、哈族群众5000余人上街示威游行。他们甚至让哈德万的女儿坐上轿子让人抬着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这一天的游行颇有“排山倒海之势”。“游行群众”沿路高呼“打倒阿合买提江”、“打倒阿巴索夫”等口号，并冲击我们在南花园的寓所。游行群众所提出的要求，从表面上看是拥护《和平条款》、执行《和平条款》、遵守施政纲领、拥护与苏亲善等。这让我们感到很可笑，这些要求恰恰是我方代表一直以来的立场。我方本来就为上述要求得不到落实而感到愤怒，国民党顽固派组织群众游行，提出上述要求，真是欲盖弥彰，不打自招。事实胜于雄辩，明明是国民党顽固势力肆意践踏《和平条款》、不执行施政纲领，

蛊惑人心，制造矛盾，反而说成我们没有执行《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今天组织游行的真正动机，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这场游行，把破坏《和平条款》的罪名强加在三区代表身上。

游行的群众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很多人被强迫参加，多数受人蒙骗，不了解事实真相。当他们了解到游行的实质后，不少人很快改变了口号，呼喊反对国民党的口号。走到半路时，三人一堆，五人一伙纷纷走散。剩下的几个领头，见势不妙，也夹着尾巴悄悄溜走了。这样，由国民党顽固势力挑拨离间、蓄意组织的所谓回、哈群众游行再次受挫。

总之，2月24日的所谓“群众游行”仓促上马，又很快收场。

请再看当时包尔汉先生就2月24日游行所写的回忆录的片段：

“2月24日上午，突然在迪化街上出现了由3000多名回族人参加的游行。也有不少骑着马的哈萨克人人为他们带路。他们一路上喊着‘拥护中央政府’、‘反对三区特殊化’等口号。事件过后，经我们调查，原来这是警备总司令宋希濂乘张治中到南京去的机会，召集一批军官，暗中谋划‘以游行反游行，以请愿反请愿’反对三区活动的一部分。他们蒙骗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命令部分士兵换上便服，让他们上街游行，以反对三区。”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

然而“群众游行”并未就此停止。

阿合买提江发觉这一天的游行完全是国民党右翼势力所为，并预料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可能还要发生更为严重的事件。

夜已经很深了。阿合买提江与伊宁方面通电话，要求部队进入戒备，注意事态的发展。他又和包尔汉先生电话联系，同阿巴索夫、赛福鼎和赖希姆江进行商榷，甚至同国民党官员通电话，指出有人在秘密组织反对三区代表的“群众游行”。他知道电话肯定会被对方窃听，所以，他和自己人通电话时往往使用反义词、暗语来表述关键的问题。几天来，有人竟敢聚众闹事，高喊打倒阿合买提江，这一切使我们感觉到情况会进一步恶化。他将迪化出

现的这些情况及时用电报发给在伊宁的民族军总司令伊斯哈克伯克将军。伊斯哈克伯克同志和阿合买提江保持着紧密联系，密切注视事态发展。鉴于在迪化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伊斯哈克伯克同志命令前线部队进入紧急状态。玛纳斯河西岸的民族军前线部队的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表示，如果我方代表出现什么意外，他们将随时向迪化发起军事行动。

那一天晚上，阿合买提江一直都没有入睡，他一直很沉默。我在他身边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他反过来劝我早点休息。但我也感觉到局势紧张，根本没有睡意。阿合买提江彻夜不眠，时而站起，时而徘徊，有时久久地凝视睡梦中的女儿。国民党顽固势力这两天连续搞群众游行，搞得人心惶惶。很显然，宋希濂之流并不会就此罢休，筹划着更大的阴谋。他们再次组织了以军警、士兵、三青团员、国民党员等为主体的另一场群众游行，企图达到其险恶目的。这场游行最终演变成震惊全疆的“2·25”血腥惨案。

1946年2月25日，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现阿合买提江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天刚刚才蒙蒙亮。

由于这几天连续发生危机，阿巴索夫这天一大早打来电话，请求阿合买提江这一天暂时不要去上班。而他自己和其他我方代表像平常一样先到机关上班，了解事态的发展。果然，阿巴索夫发现城内气氛紧张，又有群众要上街游行。不一会儿，阿巴索夫打来电话说有很多可疑“群众”已经聚集在政府大院门口。阿巴索夫告诉阿合买提江现在情况不明，请他暂时不要来，如果有什么情况，他会立即报告。阿合买提江镇定自若，冷静观察事态的发展。

这时候我们家里的电话线突然中断了。

10时左右，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和迪化警备副总司令党必刚匆匆忙忙跑到我们家来接阿合买提江去省政府开会。他们进来告诉阿合买提江说，有很多群众在冲击省政府，要求见阿合买提江副主席，看来阿副主席不去不行。其他省政府委员也在等候阿副主席开会，研究如何解决事态的发展。

阿合买提江忽地站起来，急忙穿上大衣，毫不犹豫地往外走。我在一旁不知所措，说不出话来。可是他出门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似乎忘了什么又转过身，回到熟睡的女儿身边亲吻她的前额并会意地看了我一眼，说声“再见”，就与刘孟纯、党必刚一起走了。我缓缓回过神，浑身发软，感到情况

非同一般。他走后，家里的电话再也不通了，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几乎全部中断。我觉得势头不妙，立即出屋去看看外面。帕合尔丁·霍加还有警卫排的战士们个个进入了紧急状态。整个院子显得空气凝重，大门紧闭，警卫战士有的爬上房顶，有的子弹上膛。

街上的人们疾步向城门方向走去，嘈杂声、喊叫声越来越高。时而从城内听到“砰砰”枪响。我想打电话给阿合买提江，但电话无法打通。于是，我立即跑出去找我方代表，市警察局副局长孜亚·赛买迪。我告诉他家里连电话也不通了，城内还有枪声，这是为什么。他立即跑进屋里摇电话，但电话仍然没有打通。这时帕合尔丁·霍加也过来了。他俩相互使眼色，好像暗示了什么，便走开了。不久，我得知孜亚也去了南门。没有过半个小时，帕合尔丁·霍加进来神色紧张地对我说：

“情况紧急，城南大门已被国民党封死了，城墙上架起了机枪，国民党的人在政府大院把先生给围住了，具体情况目前还不明。不过您不要怕，他们休想动先生一根毫毛。我们已通知了民族军玛纳斯前线指挥部。”

听到这个消息，我全身颤抖，预感国民党匪徒要下毒手了，一种无形的恐怖缠绕着我。情况十分危急，我看得出大家尽量努力在安慰我，脸上没有平时的笑容，个个显得格外紧张。我看见帕合尔丁，他平时把手枪藏在衣服里面，而今天他却全副武装，手枪也露在外面了。

临近中午时分，孜亚·赛买迪来了。他告诉我说：

“我们的人已经在南门城门外堆满了棉花包、汽油桶，不过城内的情况不明。如果我们代表有什么危险，我们就会立即点燃汽油，冲进城内把我们的领导人救出来。”

他刚一离开，帕合尔丁·霍加又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断然地对我说：

“夫人，看来您必须要做好走的准备。阿不来提·买合苏木和几个人手里拿着火柴已经爬上城墙往城内喊话说：‘如果不让代表们出来，就要点火！’”

帕合尔丁望着无忧无虑躺在床上的孩子，又对我说：“孩子还小，小心不要着凉。您收拾一下急需的东西带上，其他的全都扔下，请您立即做走的准备。”他说着便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小巧玲珑的手枪，用布块包上递给我说：



1947年，迪化局势紧张，玛依努尔正式担当起阿合买提江的秘书工作。坐者为阿合买提江，右为玛依努尔

“请你把它带在身上。”

烟雾笼罩着天空，我让帮我看孩子、收拾家务的吐尔逊罕和养女热孜万古丽立即收拾东西。而我全身无力，无从下手。

我突然醒悟过来，第一想到的是先生留在他书房里的文件。平时他对这些文件非常保密，经常嘱咐我注意保存好文件。现在，我要“撤退”了，这时候当然要担当起我的责任，不能让先生的文件落入敌人之手。于是我立即跑进屋里小心地收拾文件。为了保证安全，我灵机一动，把一些重要文件藏进孩子的襁褓里。此时我转身看挂钟，时针已指向了下午两点。

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太阳开始西斜。帕合尔丁·霍加与孜亚·赛买迪走了进来，我想出发的时间到了，他们是来接我的。我的心噗噗跳动，心想不知道还有什么危险在等着我。我正准备去抱孩子，他们却对我说：

“夫人，你该放心了。先生给包围城墙的群众写了一封信，我们都看了，

他安然无事，你放心吧。”

先生还活着！听到这消息我激动万分，跑进卧室紧紧抱起我的孩子，顿时我的双眼被泪水浸湿了，但还没有见我的先生回来。

夕阳落山，天色渐暗。当我心情忐忑不安、忧心忡忡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急忙拿起了电话，电话是孜亚·赛买迪打来的，他告诉我阿合买提江先生很快就要回来。果真，街巷一片喧闹，口号声、笑声传入我的耳朵。警卫战士打开大门，五辆大卡车满载人群，缓缓停在我们住宅大院门口。人们簇拥着阿合买提江，欢天喜地走了进来。国民党警备副总司令党必刚亲自“陪同”阿合买提江，把他送了回来。他不外乎怕出现意外，否则不好向主子交代，不得不亲自护送阿合买提江回家了。

“我们胜利了，阿合买提江先生万岁！”

人民的呼喊声响彻云霄。我听到阿合买提江向人群高声呼喊“感谢人民！”这时候我才相信他平安地回来了。

阿合买提江对身边的党必刚说他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去了。挤满院子的人们群情激荡，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们的笑声告诉我们，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惨遭失败，你死我活的搏斗，最终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阿合买提江感谢送他回来的人群，让大家先回去。他留下阿巴索夫、赛福鼎、赖希姆江等总结白天发生的血案。大家义愤填膺，谴责国民党的暴行，深切哀悼被杀害的人士。阿合买提江再次鼓舞大家的斗志，要求大家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坚守岗位，斗争到底。

几天的紧张时刻，守卫在玛纳斯河岸的我民族军指战员，不断向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提出严正警告。伊斯哈克伯克将军连夜赶到桥头，用望远镜观察河东守敌，让所有指挥员发誓，必要时将向迪化进攻，哪怕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他对指挥员们说：“如果他们敢动阿尊（指阿合买提江）一根毫毛，你们须和我一起过河。”

当阿合买提江被围最危险的时候，伊斯哈克伯克将军命令民族军前线指挥部派代表向驻守玛纳斯河东的国民党哨所送信，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民族军将横跨河流，发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河东防守司令徐汝诚连续给宋希濂打电报叫苦：如果在迪化的对方代表出事，不能排除河

西军队对我进攻的可能。为防止我弟兄流血，建议慎重行事。

1947年2月25日这一天，阿合买提江整整一天没吃没喝，显得十分疲惫。我心疼地想让他吃几口饭暖暖身子，但不论是他还是我，都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他把桌上的盘子往边上一推，慢慢地站起来，来回踱步，坚定地对我说：

“国民党的凶恶面目终于在我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了。真理宁可弯曲，但绝不会折断。如果我遭到敌人杀害，那也是为真理而牺牲。这种牺牲至高无上，值得！但我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人民绝不会忘记！今天如果我没有回来，你千万不能难过，应该拿起枪杆，继续与人民并肩战斗。我们被他们包围冲击，甚至殴打，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要杀害我。明的不行，他们来暗的，要花招想让我爬上梯子翻过后墙逃跑。我立即明白这是一个圈套。如果我中计，他们会让我埋伏在后面的打手把我打死。而后他们向公众宣布‘阿副主席是被群众乱拳致死’，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然而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最终我们还是胜利了。”

夜深人静，先生仍然不能入睡，安慰我，久久凝视着睡梦中的爱女，轻轻亲吻女儿的脸庞，自言自语地说：

“差一点爸爸回不来了，宝贝！一切都会好起来，好好睡吧，孩子。”他转过身来又问我当听到城内发生的情况时家里是什么情况。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白天发生的一切。先生强压心中的怒火，响亮地怒吼：“人民的鲜血绝不会白流！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为漫长、最为紧张的一天。

这天在城内的情况是这样的：

阿合买提江由刘孟纯和党必刚接到省府时，发现神情慌惑、行动诡秘的人群拥挤在大门口。根据这两天的情报，他马上断定这是军警当局有计划、有预谋的安排。有些人穿的便服外面露出了里面穿的军服；有些人衣服里面藏着手枪或手榴弹，鼓鼓囊囊的一看就能看出来。他们都是伪装成老百姓的军人和警察，很多人暗藏着武器。这是国民党当局组织起来的群体，年龄相仿，便服色彩单一，看得出他们的组织纪律性很强，有几个人在秘密指挥。“群众”当中还有很多三青团员、国民党员。当然，人群中也有不少不明真

相的老百姓，他们中很多人是被骗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不少是被警察赶到这里来的。

游行者的不断高呼口号，拥挤紧逼省府大门。明显看得出有人在煽风点火，在组织指挥。人群情绪越来越激动，不断叫喊：“红腿子（指共产党）的头儿出来！”“阿合买提江出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当阿合买提江走到政府大门口下车时，穷凶极恶的暴徒冲上来朝阿合买提江的腰部打了几拳。这群匪徒还故意露出藏在衣服里的手枪，进行威胁。

阿合买提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健步走进会议室。政府委员都到齐了，阿合买提江主持召开会议。在会上，阿合买提江怒斥有人预谋并策划这出戏，揭露所谓的“游行群众”受人操纵。

外面响声越来越大，游行的“群众”砸坏政府大门逼近会议室，院内一片混乱。这时阿巴索夫低声告诉阿合买提江，国民党的门卫放纵游行队伍进入了大院，也没有任何人阻拦游行队伍。话音未落，突然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枪声。身穿便服混在“游行队伍”里的国民党士兵把手榴弹扔进大门传达室，包尔汉先生的司机穆努甫当场被炸死，还有几个无辜的群众被抓走。

尽管外面乱作一团，阿合买提江稳如泰山，也不许任何人离开会场。

阿合买提江被围的消息，激起了城外群众的极大愤慨。成千上万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南门。城外人山人海，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民代表。人们高呼：“我们的代表如有三长两短，就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同胞们，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与其等死，不如拼命。”愤怒的群众呼声四起，把装满汽油的油桶、棉花包堆积在南门外。群众情绪万分激动，冲向城门。

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下令紧闭城门，调来大批军队，在城墙上架起机枪，枪口对准围城的群众。

会议室里开会的人慌乱了起来。但是，阿合买提江纹丝不动，命令警备副总司令党必刚不许离开自己一步。党必刚在表面上也罢，一直守在先生身边。包尔汉、阿巴索夫、赛福鼎、赖希姆江等见阿合买提江稳坐原地一动不动，更受鼓舞。大家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包围政府大楼的所谓“群众”穷凶极恶，喧闹声达到了高峰。而城外成千上万人民群众包围城南门，要求

当局立即放人，否则要放火烧城。消息不断传来，所谓的“游行群众”听到城门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而且堆积了汽油桶、棉花包，要放火烧城，队伍当中的很多人开始动摇了起来，好多人开始软了。他们似乎感到自己在犯罪，连累了城外的老婆和孩子。他们变换手法派代表请求阿合买提江下命令解散围城的群众。代表中有人甚至差点跪地求饶。阿合买提江顺手拿出一张纸，简单写了几行字，交给前来求饶的所谓代表。信的内容是城外包围城墙的人民不会伤害城外居住的无辜群众。但是你们所谓游行的群众必须立即解散！否则发生的一切后果概不负责。

但是有几个“铁杆”代表仍然纠缠不放，无理取闹，要求阿合买提江到外面去亲自向游行群众作解释。阿合买提江非常生气，把纸条从“代表”的手里夺回来，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这时党必刚装出十分为难的样子对阿合买提江说：

“看来，您不出来说话，他们可能不散。他们强烈要求您回答他们的问题。”阿合买提江对党必刚严正警告道，如果今天当着你们这些将军们的面发生流血事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阿合买提江又严肃地对党必刚说：

“现在对你来说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请你立即到外面去下口令，命令你的士兵‘向后转，齐步走！’你的士兵走了，我们再到南门外解散那里的人民群众。这样和平就可以继续。另一条路是你敞开大门，让你的士兵冲进来，让他们杀了我！这样，城外的人民也会冲进来。这意味着今天在迪化、明天在全省流血和战争重新开始。这两条路任你选择……我们不怕死，我们早就作好了死的准备。如果我们活着，会对人民有利！我们是要按照《和平条款》为人民造就民主和自由。如果我们牺牲了，这对人民会更有利。因为人民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谁在破坏《和平条款》。人民将会起来斗争，争取比今天的《和平条款》更为伟大的自由。我们的血可以为人民带来解放，这种死对于我们是光荣的死。”

国民党右翼势力觉得这样闹下去后果不好收拾，立即变换伎俩，企图用别的方法除掉阿合买提江。于是，他们在会议室后墙上准备了一个梯子，假惺惺地劝阿合买提江从后门溜出去，爬上梯子越墙逃跑。阿合买提江看透了

敌人设下的圈套，揭露这是一个更为险恶的用心，坚定地说：

“先生们，我不会抛开会议到任何地方去。如果游行者的闯入会议厅，胆敢加害于我们，这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坐在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会议厅里的你们各位来承担全部责任。我再提醒一点，诸位阁下，我们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如果我们当中有谁受到游行者的迫害，那么这就意味着战争的重新开始！”

阿合买提江的这些话决不是在吓唬人。城外愤怒的群众越集越多，随时准备冲进城内。

天色越来越暗，城外的人群越来越失去耐心。突然，有人喊道：“同胞们，不能再等了，大家来呀，把城门给烧了！再等下去就会失去我们的代表啦！”呼声时起时伏，人群又重新动荡起来，整座城市面临着被大火焚烧的危险。城墙上的国民党士兵也对准机枪，只差扣动扳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一触即发。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阿合买提江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向城外群众递出了一封亲笔信，说明自己平安无事，要求大家耐心克制，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要求我方人员对外围的群众进行耐心的劝导工作，阻止过激的行动。然而围城的群众对前来做工作的我方人员愤恨地说：

“难道你们眼看着国民党大开杀戒不成？再不冲进去，我们就会失去阿合买提江先生。”群情再次激愤，怒火冲天。

政府会议室里，阿合买提江继续痛斥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官员，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冷笑着让他们赶快收起自己一手操办的鬼把戏。当外面枪声、爆炸声、叫声、哭声乱作一团时，他仍然稳如泰山，将生死置之度外。当国民党官员手忙脚乱、尴尬无奈的时候，阿合买提江嘲笑说，真正吓破胆的恰恰是在座的一群愚蠢之辈。他带着轻蔑的口吻讲了一段颇有讽刺意义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总觉得手下将领不得力，对自己不忠，他要用最巧妙的办法考验考验自己的手下。

有一天，国王请手下的所有将领到王宫里来吃饭。将领们一个个急急忙忙步入王宫，争先恐后向国王拜礼，生怕显得对国王不忠。国王示意将领们围着备有丰盛饭菜的餐桌坐下。原来国王为了考验这群将领，故意在菜中秘密安放了一颗炸弹。这时，还没有等国王发话，其中一个贪婪的大臣伸出手

刚要把叉子插入盘子里，叉子触动炸弹突然爆炸。皇宫一片大乱，这些愚蠢的将领有些人趴在桌下面，有的爬进床底下，有的不顾一切往外逃。只有一个满脸长须，年老痴呆的将军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国王很生气，把所有的人召回来说：‘今天，我把你们召来是为了考验一下你们是否真正忠诚于本国王，结果你们都是些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把本国王丢下都跑了。’接着他指着那个在原地不动的老将军说：‘应该要像他一样有勇气才对，他和我生死与共。我要惩罚你们，对他要重奖。’国王转过身问这个老将军：‘你是最忠于本国王的将军，你现在需要什么，由我来奖赏，我保证让你荣华富贵。’

老将军动也不动，坐在原地向国王行军礼：

‘尊敬的国王！此时此刻对我来说，在这世界上我最需要的、最为重要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条裤子！我的裤子里面都已经满啦。请你赶快奖励一条裤子给我吧！’”

阿合买提江讲完故事，环视四周，对着惊慌失措、目瞪口呆的国民党官员，轻蔑地问道：“今天，这件事正好也发生在这里，你们心里很清楚，请问哪一位现在最需要换一条裤子？”

我方代表放声大笑，国民党高官一个个皮笑肉不笑，显得十分尴尬。

阿合买提江彻底揭露了敌人的阴谋，粉碎了敌人的险恶用心。国民党当局觉得阴谋未能得逞，再这样下去后果严重，暗下命令，“游行”队伍很快散去。

当阿合买提江踏着豪迈的步伐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国民党军警人员受其主子之命，在马路两旁维持秩序，乖乖地为阿合买提江开路。阿合买提江乘上汽车，由党卫军护送，驶出南门。

城外急切等待的群众看到阿合买提江突然出现，激动万分，振臂高呼口号：

“我们的代表回来了！”

“我们的代表万岁！”

“阿合买提江万岁！”

阿合买提江走出南门，立即被在场的群众层层围住。心中充满怒火的人民，几乎把阿合买提江连车带人抬了起来。阿合买提江立即站在小车上向

万名高呼口号的群众大声讲话：

“尊敬的同胞们！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们应该以和平的方法寻求真理！我们为真理而斗争。为了真理，我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们过去为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惜流血牺牲，进行战斗，现在同样也为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所以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前程将无比辉煌！……”

人民群众发出的“乌拉”声，冲破了迪化的天空。城墙上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直愣愣地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简言之，1947年2月25日，由国民党顽固分子一手导演的所谓“群众游行”，不仅仅要杀害阿合买提江等三区代表，而且是要彻底破坏联合政府。然而这些走狗及其幕后的“导演”最终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在宋希濂等的秘密指挥下组织起来的游行，许多证据落到了我们的手里，均在我方报刊上公布。其内容如下：

1. “游行”的传单、口号均由警备司令部方面印刷，并翻译成维文。一个名叫谢奕杰（音译）的翻译承认了这一事实。
2. 国民党军警人员强迫很多汉族市民加入“游行”队伍。
3. 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在南门前布置了铁丝网。
4. 让军校学生公开参加了“游行”。
5. 蒙骗群众，说参加游行的农民将会得到补贴。
6. 看见省政府大楼前发生死人事件，参加游行的农民纷纷从北门逃离游行队伍。

这次“游行”，暗中有王增善、蔡宗贤、刘效黎、陈希豪等政府官员指挥。

（此文发表在三区政府机关报）

上述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这次事件完全是由国民党当局一手策划的。在这次血腥事件中，我方人员和无辜群众好几个人失去了生命。在政府大楼前牺牲的有：穆努甫阿洪（司机），41岁；达吾提（鞋匠），40岁；伊布拉音（打工的），40岁；玉苏音（烤馕匠），37岁。

在北门被国民党绞死的有：亚斯纳洪，25岁；贾帕尔，22岁；萨比提，55岁。

除此以外，被国民党军用枪托打伤两人，其中一人受重伤，另有两人失踪，六人被关押。

尽管国民党顽固分子千方百计巧妙伪装，但最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密谋这一“游行”的国民党当局高官宋希濂先生最终交代了真实情况。也许他在晚年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在这里，我想通过他亲笔写的回忆录来进一步说明惨案发生的经过。宋希濂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

张治中感到伊方给予他的压力太大，当然也感到自身的责任的重大，于是就一再召集会议，谋求应付局势的办法。我记得在1946年12月间，张治中在新大楼（张的住所和办公地点）连续邀集党、政、军、特负责人举行会议，参加的人有：刘任（行辕参谋长）、刘孟纯（行辕秘书长）、陈希豪（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谢永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杨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委员，谢、杨两人均为“中统”骨干分子）、王曾善（民政厅厅长）、刘亚哲（迪化市警察局长）、宋希濂（新疆警备总司令）、沈静（警备总部参谋长）、马呈祥（骑五军军长）、叶成（七十八军军长）、罗恕人（四十六师师长兼迪化警备司令）、梁客浔（新疆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余万选、姚铁珊（军务处处长、副处长。这两人是军统骨干分子。当时的军务处，在名义上属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实际上归行辕直接指挥）等人。有时人多一些，有时人少一些。座谈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一致认为局势日趋严重，应采取有效方法遏制伊方势力的发展。会上有人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和伊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最后张治中也同意这样办。并推定刘孟纯、梁客浔、谢永存、杨为、余万选、姚铁珊、刘亚哲、黄锡恭（第九分校政治部主任）等人组织一个小

组，研商具体办法，由刘孟纯负责召集。

1947年1月张治中去南京，临行时还嘱咐我们对于用组织对组织，用宣传对宣传的方针，要积极进行。

.....

22日晚间，我们在新大楼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者有我及刘任、陈希豪、谢永存、刘孟纯、王曾善、梁客浔、沈静（新疆警备总部参谋长）等人，由刘孟纯汇报了当天省府会议的详细情况后，大家认为决不能使七个区的统治权就这样逐步丧失，必须采取坚决对抗的方针。并决定以示威游行对付示威游行，以请愿对付请愿，给伊方势力以反击。由刘孟纯、谢永存、梁客浔立即进行具体部署。

.....

（2·25事件的）第二天屈武委员对我说：当群众撞击大门，吼声震天时，他们在省府会议室感到情势十分紧张，有些人提议从省府后院一间卧室里的天窗爬出去。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坚持不同意，并说：“他们如撞进来，就把我打死好了，我不怕。”屈武并以敬佩的口吻说：“在这样临危的时候，阿合买提江不失为革命者的本色。”

.....

无论如何，宋希濂好像也说了一些真话。

阿巴索夫同志是二月惨案的经历者，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为《记迪化2·25血腥事件》一文，深刻地描绘了细节。我把这篇文章奉献给读者，以便更加清楚事件的经过。原文如下：

记迪化2·25血腥事件

阿·阿巴索夫

1947年2月25日晨，迪化浓雾弥漫，甚至几步远的人也无法辨认。不知何故，今天，整座城市好像被无形的恐怖所笼罩，有一